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研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 乌古斯

和回鹘研究

李树辉◎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 研究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 乌古斯

## 和回鹘研究

李树辉◎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古斯和回鹘研究/李树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6

(敦煌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105-10925-8

I. ①乌… II. ①李… III. ①乌古斯突厥人—民族历史—研究  
②回鹘—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308②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8929 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虞农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745 千字

印 张:29.75

定 价:75.00 元

ISBN 978-7-105-10925-8/K·1922 (汉 105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敦◆煌◆学◆研◆究◆文◆库◆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 编

主编 郑炳林 樊锦诗

编委 方广錩 邓文宽  
张涌泉 罗世平  
郑阿财 郑炳林  
赵和平 郝春文  
荣新江 樊锦诗

编务 冯培红 魏迎春

## 《敦煌学研究文库》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了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了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 年成为兰州大学“985 工程”敦煌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 年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其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住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今后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同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及其近年或以前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在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了作用。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为整个学术界的研

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学生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通过对此类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促进很大。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经过培养的日本留学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专业博士授权点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敦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在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上体现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自1945年研究院成立至今，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中心。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提高，出了很多研究成果，经与民族出版社等单位协商，决定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出面组织，以“敦煌学研究文库”名义结集出版，将研究所的最新科研成果刊布出来，供学界参考。

## 内容提要

乌古斯是包含有 24 个部落的突厥语部族，公元前 2 世纪形成于东部天山地区。此后由于汉朝与匈奴对该地区的争夺以及自 6 世纪中叶开始突厥的西向扩张而散布于东起蒙古高原，南达河西走廊，西至锡尔河东岸及费尔干纳盆地东缘的广大地区（后又进而扩散至黑海以南地区）。本书利用汉语、突厥语和波斯语史料，相互比勘、印证，首次从乌古斯部族的形成、发展史角度切入，对匈奴帝国、柔然汗国、前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关系，乌古斯部族和胡人部落的关系以及“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在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的构成、分布，喀喇汗王朝汗室所属部落，乌古斯部族与诸多现代民族的关系以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在民族史学理论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 Synopsis

Oǰuz (乌古斯) consists of 24 turkic tribes, which formed Eastern Tian Shan district in 2th century B. C. . Du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the Huns in eastern Tian Shan district, and since mid -6th century A. D. Turk have expanded towards the west , Oǰuz are scattered the extent of Mongolian plateau in east, He Xi Zou Lang ( in Gansu province of China) in south, the eastern bank of Syer River and Fergana (费尔干纳) basin in west (later, scattered to southern area of the Black Sea). This book make use of Chinese, turkic language and persian 's historical data to contrast , correct and confirm Oǰuz's forming,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relations of Huns' empire, Rou Ran's kingdom, Former Turkic kingdom, the second Turkic kingdom and Uighur kingdom, also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Oǰuz tribes and Hu Ren trib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hi Xing Uighur and Jiu Xing Wuhu. The author put forward new idea about Hun, Rouran, Turk, Uighur's component parts and distribution situation, Karakhanid's king family's tribe source, also inclu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Oǰuz tribes and modern nationalities, the forming of modern Uighur and the Yugur nationality, meanwhile, making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ethnic historical theory.



## 凡 例

一、本书所引用的突厥语材料，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律采用通用的宽式国际音标注音，清辅音的送气符号均省略不标，长音以“:”（个别转引材料中用上加横线）标示。国际音标与学术界习用的拉丁转写符号的对应关系为：

a (=a)	æ (=e)	ɛ (=ä)	e (=e)
ĩ (=ĩ)	i (=i)	u (=u)	y (=ü)
o (=o)	ø (=ö)	b (=b)	d (=d)
h (=h)	f (=f)	g (=g)	χ (=h)
ǰ (=j)	k (=k)	l (=l)	m (=m)
n (=n)	p (=p)	ƒ (=č, ç)	r (=r)
s (=s)	t (=t)	w (=w)	v (=v)
ʃ (=š, sh)	j (=y)	z (=z)	ʁ (=gh, ɣ, γ, ğ, ğ̇)
q (=q, kh)	ǰ (=z)	ŋ (=ng)	ʒ (=ž, ž̇)

二、参考文献采用缩略语形式，全称请参看书后所附“缩略语与主要参考文献”。

例如：

《词典》= M I - III = [喀喇汗王朝] Mehmüt Qeŋqeri. Tyrki tıllar dıwanı (麻赫穆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词典)。第1-3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1983、1984。

《法师传》= [唐] 慧立、彦惊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

三、“出处注”采用间注形式，“说明注”（包括部分较长的“转引注”）采用脚注形式。

## 目 录

绪 论 扑朔迷离的世纪难题·····	(1)
第一章 秦汉至突厥崛起之前的乌古斯历史考辨·····	(7)
第一节 乌古斯的起源和涵义诸说之检讨·····	(8)
第二节 大月氏西迁及相关史事发微·····	(12)
第三节 乌古斯的由来及其文化意蕴·····	(18)
第四节 狼图腾文化是乌古斯部族的标志·····	(34)
第五节 柔然国、高车国和乌古斯部族·····	(42)
结 语·····	(45)
第二章 乌古斯部族诸部落史迹考·····	(46)
第一节 乌古斯部族的构成·····	(46)
第二节 Buzuq 集团诸部落史迹钩沉·····	(49)
第三节 Ufjoq 集团诸部落史迹钩沉·····	(67)
第四节 乌古斯部族诸部落的岩刻印记·····	(83)
结 语·····	(90)
第三章 乌古斯与突厥、回鹘、突厥蛮关系考·····	(91)
第一节 “阿史那”语源、语义考·····	(91)
第二节 突厥和前、后突厥汗国辨析·····	(96)
第三节 Toquz 的文化意蕴和 Toquz Oǧuz 的由来·····	(110)
第四节 突厥蛮 (Tyrkmæn) 考辨·····	(117)
结 语·····	(124)
第四章 回纥的构成及其发展·····	(125)
第一节 Ujǧur 的涵义及其指谓·····	(126)
第二节 “十姓回纥”是早期回纥集团的主体·····	(131)
第三节 “甘凉之变”和回纥王统的转移·····	(137)
第四节 内讧导致了汗国解体·····	(144)
第五节 “内九族”、“外九部”说辨正·····	(149)
结 语·····	(161)
第五章 回鹘西迁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163)
第一节 回鹘西迁前西域地区的政治形势·····	(163)
第二节 回鹘汗国的西部疆域·····	(183)
第三节 回鹘西迁目的地及其分布区域·····	(188)
第四节 “葱岭西回鹘”问题辨正·····	(192)

第五节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	(196)
第六节	喀喇汗王朝与于阗政权及中原王朝的关系	(208)
结 语		(218)
<b>第六章</b>	<b>龟兹回鹘的历史发展</b>	(219)
第一节	龟兹回鹘的构成和撒里畏兀儿的含义	(219)
第二节	龟兹回鹘与周边政权关系考	(226)
第三节	撒里畏兀儿东迁和裕固族的形成	(239)
第四节	西部裕固语的构成特点	(248)
结 语		(252)
<b>第七章</b>	<b>高昌回鹘王国史考辨</b>	(254)
第一节	东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居民和文化	(254)
第二节	仆固俊部是从吐蕃手中收复西州、北庭等城的吗	(261)
第三节	西州回鹘和龟兹回鹘的关系	(263)
第四节	高昌回鹘王国的建立时间及其疆域	(266)
第五节	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	(273)
结 语		(297)
<b>第八章</b>	<b>甘州回鹘史考辨</b>	(298)
第一节	河西地区的早期突厥语居民	(298)
第二节	回鹘南下和河西回鹘的构成	(303)
第三节	甘州回鹘首领称汗的时代背景和称汗的时间	(310)
第四节	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318)
结 语		(332)
<b>第九章</b>	<b>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形成过程</b>	(333)
第一节	维吾尔族的形成时间	(333)
第二节	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	(335)
第三节	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	(356)
第四节	维吾尔族的正式形成	(378)
结 语		(382)
<b>缩略语与主要参考文献</b>		(384)
<b>汉文综合索引</b>		(407)
<b>突厥文综合索引</b>		(453)
<b>后 记</b>		(463)

## 绪论 扑朔迷离的世纪难题

在古代突厥语族群史研究中，乌古斯（Oğuz）与回纥（Uğur，=回鹘）这两个概念常互相纠缠在一起，复杂难辨。这两个专名，究竟是指同一群体，还是指两个不同的群体？若说是指两个不同的群体，那么，当属于什么范畴？也即是说，其各自的构成究竟是血缘性的（部落、部族），还是政治性的（部落联合体）？相互间及其与突厥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凡此等等问题，不仅与突厥史、回纥（鹘）史及其他诸多古代突厥语部落史、部落联合体史息息相关，而且与诸多现代突厥语民族史紧密相连。

正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古代突厥语族群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自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于1893年12月15日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成果<sup>①</sup>后不久，便引起了这一领域内所有学者的关注。此后陆续出版的专著或发表的论文，大多都涉及这一问题。纵观诸家观点，总括起来，约略有以下三种：

**同一说。**这是汤姆森在《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oghuz为一极古之民族，其时代如何，尚莫能定；此oghuz一名，后复出现于突厥语地域内许多处。其形或为其原始之oghuz，或为之uz，或oghur，则今日居于俄罗斯东部民族之总名也，其语言之特点，在以r代其他通常之z，例如on oghur = on oghuz，此云‘十姓oghuz’。此种oghuz人，最初似在突厥统治之下，在新帝国建立后，突厥可汗似亦曾施其统治权，但此种关系，甚不坚固。且彼此不甚和睦，故冲突叛变之言，常见不鲜云。”<sup>②</sup>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对Oğuz与Uğur两词的语言学考释基础上，即认为Uğur为Oğuz的一种颤音化形式，二者实指同一“民族”。此说初为学者们一致接受，后又为许多学者所怀疑（参见哈密顿 1983—1984）。

**种属说。**这一观点以马夸特（Marquart）及夏德（F. Hirth）为代表，认为Oğuz是回纥及同罗、拔野古、浑、思结、阿跌、白霁等诸部之总名，Toquz Oğuz是Oğuz中的Uğur因构成政治上之九姓而产生的名称，因此，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九姓回鹘。也即是说，认为Toquz Oğuz等于Uğur，Oğuz与Uğur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乌古斯是

① 该报告的法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enissei. Notice Préliminaire）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

② 引自岑仲勉1958a收录之韩儒林译文。原刊于1937年《禹贡》7卷，1、2、3期合刊，P. 216。

主流，回鹘是支流。乌古斯是正式成员，回鹘是助手”（安部健夫 1955, P. 278）。

**不同部落说。**这一观点以拉德洛夫（W. Radloff）为代表，认为 Oğuz 与 Ujğur 是不同部落的名称。我国学者岑仲勉先生亦认为二者系同族支派之别。

迄今为止，后起之诸家观点，虽在细节上略有区别，但大致均未超出以上三说。

“同一说”的立论仅仅建立在语音考释的基础上，且未能提出 Oğuz 在古代突厥语口语中具有颤音化特点的充分论据。正如哈密顿（James Hamilton）所指出的那样：“其根据也仅仅是这些形式与 Oghuz 之间的部分相似而已。只要我们尚没有找到 5 世纪左右 Oghuz 在口语中具有颤音化特点的可靠标志，那就不应该过分重视这种猜测。”（哈密顿 1983—1984）况且，Oğuz 与 Ujğur 不仅同时出现于漠北如尼文碑铭文献（如《磨延啜碑》北面第 3 行）中，亦曾出现于回鹘文文献（如《传说》）中，而在《词典》中 Oğuz 被称为 Qebile（部落，部族），Ujğur 则被称作 el（部落联盟，汗国，国家，地面）。此外，《史集》中也明白无误地称二者为不同的群体。据此可断定，“同一说”无任何事实依据。

“种属说”将 Oğuz 视为回纥、同罗、拔野古、浑、思结、阿跌、白霁等诸部的总名，但这些部名并不见于《词典》及《史集》所列构成 Oğuz 24 部落名称之列。与“种属说”相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乌古斯与维吾尔的关系，总不外大范围和小范围的不同而已。……乌古斯可汗的布告上曾说过：‘我是维吾尔人民的可汗’。这时候，维吾尔是族名，是大范围，乌古斯是人名，是小范围。但以前在蒙古草原上初起时的回纥则不同：那时的回纥，据《唐会要》（卷 98）的记载，回纥不过为九姓铁勒的一个姓氏；而九姓铁勒，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即为九姓乌古斯。可见那时回纥是姓氏，是小范围，而乌古斯是部落，是大范围。这是乌古斯一名在维吾尔族史上前后的变化。”（程溯洛 1986）称“回纥是姓氏”，“乌古斯是部落”，明显忽视了回纥本身便是部落联合体，而古代的姓氏便源于部落名称的事实。这里虽以“大范围”、“小范围”解释，仍没能理清回纥和乌古斯的关系，甚至于使姓氏和部落的关系也变得复杂难辨了。

“不同部落说”明显忽视了 Ujğur 为一部落联合体，其内部便包含有 Oğuz 成分的事实，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在古代突厥语族群史研究中，还普遍存在着三种错误的倾向：

一是将“部落”与“部落联合体”或“汗国”不加区别。认为凡是以某名相称的，必定是同一部落。如秦汉时的匈奴本是以浑部落为核心的部落集团，其他所谓匈奴之“别种”，实则均为附属于匈奴（浑）的部落或部落联合体。这些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对外均可称匈奴，而在其内部则仍以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名相区别（关于这一问题，波斯史家拉施特曾有非常具体的阐释，详见本书第 21 页所引《史集》文）。

二是将“部族”与“部落联合体”相混淆。认为凡是以某名相称的，必定是同一血缘群体，如前突厥汗国本是以“阿史那氏”（Oğuzne，= 乌古斯的）为核心的汗国名称，后突厥汗国本是以克普恰克（Qıpçaq，= 钦察）部落为核心的汗国名称。凡附属于该汗国的所有部落，对外也均以突厥自称，而对内则仍以各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名相区别。

三是滥用“民族”（即所谓“古代民族”）概念。如“匈奴族”、“丁零族”、“铁勒族”、“柔然族”、“高车族”、“鲜卑族”、“突厥族”、“回鹘族”等。然而，在研讨具体史事时，却可发现这些“民族”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举例来说，匈奴强盛时，诸部皆以“匈奴”或“匈奴别种”相称；突厥汗国时期，诸部又以“突厥”为其共名；回鹘汗国时期，诸部则又统称为回鹘。虽则如此，仍有许多部落叛附无常，分合不定。

正因为这一概念的滥用，而导致许多问题都难以解释。譬如：公元前2世纪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雄霸整个北方草原的“匈奴族”为何自魏晋后销声匿迹？8世纪中叶“回鹘族”勃兴后，原“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周书·突厥传》）的“突厥族”何以也逐渐不见了踪影？

就语言而论，姑且不说其内部还包含有印欧语部落和蒙古语部落，单就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而言，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普遍存在于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诸层面；就文化而言，诸部落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也多有不同。可见，匈奴、突厥和回鹘实质上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性集团（汗国或部落联合体）名称。

近几十年来，“突厥族”的概念鲜有人使用，但“匈奴族”、“丁零族”、“铁勒族”、“鲜卑族”、“柔然族”、“高车族”、“回鹘族”等概念仍常见于书刊。既然承认匈奴、鲜卑、高车、回鹘等各为一“族”，则也就没有理由否认突厥为一“族”；而若承认突厥为一“族”，又恰好为居心叵测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提供了口实。

## 二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Ujbur 原本便是部落名或民族名。还有人称“此字被用作民族称谓，至少已有千余年历史，甚至超过二千年”（刘义棠 1975，P.3）。如此一来，也就必然会对《使程记》称高昌回鹘“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录、黠戛斯、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以及《词典》有关“回鹘是一个国家的名称”（M I. 151）之说难以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或正为此，有的学者在引译后段文字时，干脆将 el（国家）一词译为“地区”。

其实，Ujbur 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用以指称民族则是很晚的事。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居民（如《词典》、《福乐智慧》及《真理的入门》等书的作者）从不以 Ujbur 人自称。持以上观点的学者往往以“古代民族”的概念定义之，以示与“近代民族”或“现代民族”相区别。但“古代民族”（包括“近代民族”）的概念至今也不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已往的研究者，正因为不能准确把握以上概念的内涵，才使得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或无法解释。譬如，就“同一说”的观点而言，为什么无论在8世纪前后的碑铭文献中，或在《词典》、《史集》等文献中，Ouz 和 Ujbur 总是以相对的概念同时出现？若认为它们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为什么在所有论及 Ouz 诸构成部落的文献中，均不见有 Ujbur 这一“部落”的名称？若将 Ouz 与 Ujbur 视为不同部落的名称，《词典》为何称 Ouz 为 Qebile（部落、部族），而却称 Ujbur 为 el（部落联盟、汗国、国家、地面）？此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均说明 Ouz 与 Ujbur 的关系并非如以上三说所归结得那么简单。

古代突厥语族群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从提出到现在，已逾一个世纪，仍未能得到圆满解决。正因此而使得学者们在研究中，始终难以把握乌古斯与突厥的关系以及乌古斯与回鹘的关系，或沿袭某一陈说，或干脆避而不谈。这一问题，可以说是该领域的一个世纪难题。

这一问题之所以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对乌古

斯和回鹘各自的形成、发展历史认识不清。因此，若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准确把握各专名的意义内涵，其次必须从探讨乌古斯与回鹘的形成、发展史入手。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乌古斯与回鹘的关系（包括乌古斯与突厥的关系）也自然就明朗了。

此外，在回鹘西迁目的地及其最终落脚点问题、“葱岭西回鹘”问题、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和建立时间问题、龟兹回鹘王国史、高昌回鹘王国史和甘州回鹘史问题以及现代维吾尔族、裕固族的形成时间及其族源等问题上，学者们亦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而这些在突厥语民族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又正与学者们对乌古斯与回鹘关系的认识密切相关。

其实，Oğuz 与 Uğur 既不是指同一群体，也不是指总体与部分，更不是指不同的部落。简言之，它们并不是同一层面或同一范畴的概念——前者属于血缘性群体（部族），而后者则属于政治性群体（部落联合体，汗国）。

### 三

同历史学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突厥、回鹘史研究，可谓是难度最大、对研究者知识结构和素质要求最高的一个领域。史料所使用的语言，广泛涉及汉藏语系的古代汉语、古代藏语，阿尔泰语系的古代突厥语、古代蒙古语，印欧语系的古代于阗语、古代焉耆-龟兹语、古代梵语、古代粟特语、古代波斯语以及闪含语系的古代阿拉伯语等。史料所使用的文字又有汉文、梵文、焉耆-龟兹文、婆罗谜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如尼文、回鹘文、摩尼文、吐蕃文、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蒙古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至于研究者所使用的语言则更多，如汉语、藏语、突厥语族诸语言、蒙古语、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日语、匈牙利语等。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掌握如此多的语言和文字，因而，单从这一角度看，从事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学者，都必须特别关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

就史料的来源来看，除历史文献外，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突厥学这样多地受益于古代碑铭和出土文献。早在 1822 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札（A. Rémusat）就曾预言：“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sup>①</sup>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自古代突厥文被破解、识读后，有关这些碑铭以及大量回鹘文写本文献的转写、译释和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为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很快为史学界所利用。不过，有关碑铭及写本文献的转写、译释和研究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巴尔托里德早在 1926 年就曾指出：

碑铭除了其语言学意义外，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也并不小，如八世纪突厥的自述，在许多方面充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然而，必须记住，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发现解读碑文的钥匙起，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许多地方的解释仍有争论。如果离开语言知识，以现有的译文为基础把碑文当作历史文

<sup>①</sup> Journal des Savants, 1822, P. 595 ~ 602. 转引自耿世民 1983, P. 56.

献来利用，这种尝试可能得出并已经常常得出截然错误的历史结论。<sup>①</sup>

其实，直到今天，有关碑铭及写本文献的译释和研究仍没有结束，许多利用这些文献所得出的历史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斟酌、推敲。

就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素质而言，除要具备相关的史学知识和文献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知识，熟悉相关语言文字的史料。正因如此，自19世纪末开始，各国从事突厥、回鹘史研究的学者，如汤姆森（V. Thomsen）、马夸特（J. Marquart）、内梅特（J. Nemeth）、夏德（F. Hirth）、沙畹（Ed.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布莱胥奈德（E. Bretschneider）、德基尼（De Guigne）、福来亨（Fraehn）、莱诺（Reinaul）、巴尔托里德（W. W. Barthold）、克利亚什托尔内（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班格（W. Bang）、卜弼德（P. Boodberg）、缪勒（F. W. K. Müller）、勒尼·格鲁塞（Rene Grousset）、勒柯克（A. von Le Coq）、葛玛丽（A. von Gabain）、路易·巴赞（Louis Bazin）、勒内·吉罗（René Giraud）、普里察克（O. Pritsak）、恰哈台（S. Çagatay）、哈密顿（J. Hamilton）、李盖提（L. Ligeti）、茨默（P. Zieme）、白鸟库吉、羽田亨、护雅夫、安部健夫、佐口透、山田信夫、森安孝夫、小田寿典、百济康义、梅村坦、庄垣内正弘、冯承钧、岑仲勉、马长寿、韩儒林、冯家昇、耿世民、刘义棠等都是语史兼通。

然而，就学术界的现状而言，我国大陆地区从事突厥、回鹘史研究的学者中很少有兼通突厥语的，从事突厥语言研究的学者则多不通史。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的学者，也鲜有兼通古代突厥语和古代汉语的。至今，冯承钧、岑仲勉、马长寿、韩儒林、冯家昇等学者的论著仍是治突厥、回鹘史的学者案头必备的书籍。这固然与其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所具有的生命力密切相关，但也表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细究起来，造成研究队伍这种现状的原因，当与高校实行学籍制管理、学科分类过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独霸讲坛、语言学界重语言形式轻语言内容的学风不无关系。鲜有人研究语言的人文特点，更不用说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研究语言了。除搜寻例词、例句外，史料和史学成果对语言学界几乎无用。史学界也很少关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为此，民族史学界和民族语言学界虽“鸡犬之声相闻”，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治语者多不通史，而治史者又多不通语。语言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文献的转写、翻译层面，很少涉及文献的内容。至于对文献的断代，大多是根据其语言文字特点框定出几个世纪的大致时限，很难为史学研究所利用。况且，在突厥语史料的翻译和断代方面，也难免会出现讹误。治史的学者由于大多都难以直接利用原文献，即使原文献的转写、翻译和断代有误也无从得知。这样，根据这些译文和断代所进行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语史兼通，并非仅指兼通古代突厥语，还指兼通古代汉语，能运用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方法进行语音构拟和语音勘同。近几十年来，兼通突厥语和汉语音韵、训诂的史学研究者寥寥，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较为罕见，以至于在许多治史者看来，语言学研究方法极不可靠，甚至认为由清代“小学”家总结、归纳的语音发展规律也很成问题。这不能不说

<sup>①</sup> 巴尔托里德：《突厥诸族历史研究的现状与当前任务》，巴库，1926，P.4。转引自克利亚什托尔内，1991，P.5。



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语音构拟和语音勘同是史学研究中的传统方法，也是突厥、回鹘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由清代“小学”家总结、归纳的“古无清唇音”、“古无舌上音”等汉语语音发展规律，实则具有普通语言学的价值。事实证明，将之运用于突厥语研究同样可行。当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孤立运用这一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难免有或然性，但在有史料相佐证的情况下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没有必要因噎废食，而对这一方法投鼠忌器，弃之不用。

#### 四

民族和国家的形成，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说：由亲属部落建立的“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P.426）。恩格斯也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89）这些部落联盟进一步融合并依地域而结合成更大一级的部落联合体。这更大一级的、不同的部落联合体再经过长期稳定的发展而最终形成民族；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列宁选集》第3卷，P.176）。民族和国家是有着严格区别的：

（1）民族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国家却是一定历史时期由某些人建立起来的。

（2）“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决定》2005）；国家却是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有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机构，是统治和管理人民大众的机关。简言之，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社会历史范畴：民族是人们的共同体，而国家的本质则是政权。

（3）不同的民族可聚居一地，而任何一个国家却都有其特定的地域。

（4）民族不能人为地消灭，国家却是可以用武装或非武装力量消灭的。

（5）国家和民族的形成相前后，民族是比国家更稳定的人类共同体，民族的消亡要在阶级、国家消亡后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实现。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对所谓的“古代民族”分别使用“氏族”、“部落”、“部族”等血缘性的概念和“部落联盟”、“部落集团”、“部落联合体”等政治性的概念，而对其政权采用学术界通用的“汗国”（el），“王国”（如“高昌回鹘王国”）、“王朝”（如“喀喇汗王朝”）或“汗朝”（*xaqanije*）等称名。拟从乌古斯部族的形成发展史入手，进而探讨乌古斯部族与前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关系以及乌古斯部族与维吾尔、裕固等现代突厥语民族的关系。